

坦然接受来自亲人的照顾和各种公共服务,享受有尊严的晚年

主持人:目前国内一般有些什么样的养老模式?对于选择进入养老院,不少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无可奈何的最后的一遭,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?

朱伟珏: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养老模式,即家庭养老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。中国传统文化以“孝”为核心,由子女照顾老人的家庭养老受到普遍欢迎,也是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养老模式。中国社会居家养老率高达97%(90%为家庭养老,7%为社区养老)。而随着独生子女及核心家庭的大量涌现,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。今后,包括养老院在内的机构养老模式(目前仅占3%)将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。与中国不同,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。子女较少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,而且老年人比较自立,不太愿意麻烦和依赖子女。对于他们来说,如何度过自立和有尊严的老年生活十分重要。所以国外许多老人愿意独立生活,如果体力状况不允许,则大多会选择进养老院或老人公寓,而不会将此看作是被亲人或社会的遗弃。我曾常年旅居日本。在日本,机构养老(包括养老院和老人公寓等)是一种较为普遍也得到老年人认同的养老模式。日本老人具有较强独立性,不喜欢依赖子女。在他们看来,进养老机构接受公共服务体现了个人的尊严。由于日本是较早步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,所以各种老年设施完备,能基本满足多层次人群的需求。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政府利用已经关闭的幼儿园、中小学校舍(日本因少子化不得不关闭很多学校)改建的养老院。这些养老设施因紧邻社区而深受欢迎,既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,也使得老人们可以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。

主持人:所谓“养儿防老”在今日社会还靠得住吗?

朱伟珏: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,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早已解体,由父母和独生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主流。随着成年子女的离去,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,传统的“养儿防老”模式已经难以继了。社会养老将成为今后主要的养老模式。为了适应这一变化,有必要树立一种全新的养老观念。在这方面,西方发达社会强调自立性、有尊严和有意义的晚年生活的养老观念可以作为有益的参考。

事实上,我周边有许多上海老人都很自立。他们有尊严地安享着晚年生活。由于有退休金,这些老人经济上不用依靠子女,即便在生活方面也不愿意麻烦子女,尽量自己克服。以我旅居过的日本为例,日本人普遍认为养老问题应该由政府和自己共同解决。在养老问题上,子女承担的责任向来较少,除了人人都加入国民养老保险外,很多人还会购买各种商业养老保险。我认识一位大学女教师,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规划养老,每月要支付13万日元(约合1万人民币)的商业养老保险金。

就我个人而言,我也会尽早开始自己的养老规划。目前阶段来讲,主要做些财务规划,不过我们国家为养老准备的理财产品太少,无法满足需求。至于将来,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接受公共养老服务,身体状况允许的话,可以接受社区养老,如果体力不允许的话,可以在养老院或老年公寓安度晚年。



你还可以这样养老

【主持人】

忻之涓

【嘉宾】

朱伟珏

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教授

齐科长

某公办养老院业务主管

徐超

上海海阳集团 董事长

主持人的话

根据近年的一项统计表明,上海没有子女陪伴在身边的老年人总数达94万余人,从2013年起,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八成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。如何养老,不可避免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。本期谈话邀请了社会学家、养老机构主管和养老事业经理人一起来谈谈:你还可以这样养老——

本版插图
郑辛遥

让老人安心在养老院生活,需要社会、老人和子女共同配合

主持人:老人被送进养老院养老,子女总会被认为是“不孝,你觉得呢?”

齐科长:我进入养老这个行业近10年了。记得刚入行的那几年,子女送老人来养老院的确会有精神包袱,生怕被指责不孝,而老人心里也会有疙瘩,总觉自己好像被遗弃了。但近年来我发现情况在变化。有些子女觉得能把家里的老人送进像我们这样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,显示了自己有实力有人脉,觉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。以我所在的养老院为例,我们有500多个床位,在中心城区的养老院中是比较难得的。护理人员的配备、各项设施的落实是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指标配置的。我们目前入住的老人中有3位百岁老人,90岁以上的老人92位,还有三分之二失智失能的老者。这样的老人如果居家养老,子女显然是力不从心的。也有些家庭给独居老人找保姆,结果,不少保姆反仆为主成为家庭的主导,给老人和家庭带来更多的担忧和麻烦。

主持人: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养老院的不良新闻,还有种说法送老人去养老院等于给老人折寿,情况真是这样吗?

齐科长:我觉得在这方面媒体的报道有误。据我的观察,真实的情况真的并非如此。我也考察过不少民营的养老院,平心而论,为了生存需要,它必须得计算成本,在硬件配置上很难达标。护理人员配备不足,有些时候的确力不从心很难顾得过来。但同医护人员一样,我想,大部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出发点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好的。看了那些负面报道,作为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觉得挺委屈的。我们做过统计,在我们这里养老的失智失能老人平均寿命延长了3-5年呢。要让老人安心在养老院享受人生需要社会、老人和子女共同的配合。比如,选择进我们养老院的,我就会事先同家属沟通,让他们在正式决定之前,先带老人过来了解一下情况,熟悉一下环境。送老人入住以后,尤其是头一个月,要经常来看看他们,要给他一个过渡,不要让老人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。一般,一个月之后,老人就会渐渐适应并且喜欢上我们这里的生活。至于有个别送进养老院提早离世的老人,在我看来,最大一部分原因是事前没做好老人的工作,家属不配合,送进来就不管不顾,老人心里落差大,导致提早离开。说实话,现在收老人,我会嘱咐工作人员多了解一下家属的情况,如果家属一开始就表现得很难缠,我会建议暂时不收。我这样做其实也有不得已的原因,有些家属平时根本不来看自己的父母,一旦出了事情就立刻来兴师问罪。我以前是学医的,我们对老人的主张是能坐着就不要躺着,能站着就不要坐着,我们会每天带他们活动,做保健操手指操。但毕竟是行动不方便的老人,百密一疏,难免会出一点差错,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老人家属的理解。

主持人:老人在养老院一天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?你们养老院的收费一般老人能承受吗?

齐科长:我们严格按照行业协会要求配备软件硬件的。对于那些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,我们的护理人员要定时巡视、给他们翻身。对于行动自由的老人,这里的生活内容很丰富,有15门老年大学的科目,老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上。定期有志愿者来陪老人唱歌、做操、说话。一般六人间的话,每月花费2500元。双人间的话,收费会贵一些。

科技手段可以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,精神需求需要亲人的呵护

主持人:您从事老年事业多年,觉得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是当前比较可行的?

徐超:我做过统计,在中国社会,80%的老人不喜欢离开家去养老院。即便选择养老院,大部分老人也不喜欢到偏远的郊外,哪怕那里的硬件设施好空气好。现实情况是,中心城区的养老院很少。建立一个养老院必须符合很多相关标准,这些标准在中心城区实施起来非常困难。这就造成了中心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,而远郊有不少设施不错的养老院空置。我听说过老人申请养老院一个床位,排队要排10年!我考察过不少国外的养老院,在欧洲、日本,社区如果有五六个床位就可以设一个养老院。但在国内目前显然还不太可行。从国情出发,对于中国的老人来说还是居家养老让老人觉得安心而又自尊。但目前的问题是,子女通常比较忙碌,很少抽得出时间来探望老人,他们容易陷入孤独、寂寞和精神危机中。

主持人:你所在的区域推出的社区养老服务很受老人欢迎,这是一项怎样的服务呢?

徐超:我始终觉得“关心老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们的明天”。我所在的区是全国首批养老服务示范区,我们有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“信息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平台”,实现了全区养老服务的全覆盖,这个平台也算是国内首例。我们现在推出的养老服务就是在老人家中装上一个客户终端,老人有需要,可以通过这个终端联系我们的养老中心。老人们可以用“一键通”电话或手机,拨打我们的热线,预约个性化服务。比如,如果老人感到身体不适或发生紧急情况,只要按下特定的一个键就能接通中心平台,平台电脑屏幕上会同步跳出按键人住址等各种信息,工作人员可马上通知救助员赶赴现场,有紧急情况还可以通过信息直接通知老人的子女。当老人需要陪医取药、助浴洗澡、送餐购物、理发做饭等服务时,可用“一键通”向中心平台预约项目和时间,上门的助老服务员随身带着POS机,老人可用服务卡结算费用。有时候,老人拿着电话和我们的助老服务员能上一个多小时,这样的情形让我感到既欣慰又心酸。目前全市有4个区域已经有我们的服务了。

不过,我觉得无论养老怎么发达,中国有中国的国情,就我们个人而言,还是应该多花点时间关心老人。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解决居家养老的实际问题,老人的精神生活还是需要子女的关心与呵护。



【结束语】

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给女儿的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:“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准备,等年老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。不会让我们成为你们经济上的负担。我们这样做,不是因为担心你们不孝顺而是太爱你们,太在乎我们会成为你们的负担……”

虽然大多数老人没有雄厚的经济能力,但他们有个共同心愿:宁愿让孩子“啃老”,也不愿意自己“啃少”。父母的爱心令人动容。如果每一个子女能够用心去关心自己的父母,如果今天的我们能够早早规划,做一点物质上精神上的准备,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制定更合理的政策,让养老院、社区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更合理地铺展,享受美好的老年生活应该不是一种奢望。

